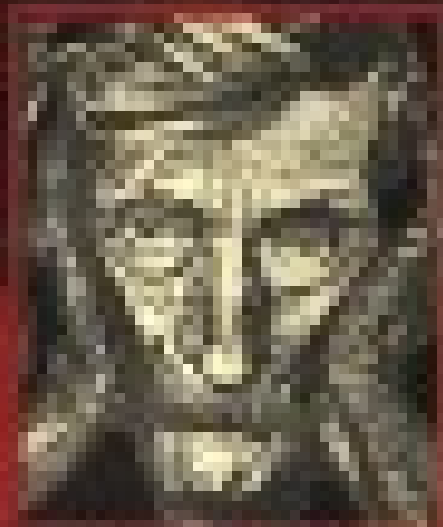


悲剧不应重演

〔苏〕 苏伦·加扎良 著
杨宗建 李 舒译



悲居不區重演





悲剧不应重演

〔苏〕苏伦·加扎良 著

杨宗建 李 舒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悲剧不应重演

(苏) 苏伦·加扎良著

杨宗建 李 舒译

责任编辑 李云阁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40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10册

ISBN 7-215-01302-2/I 76

定价4.70元

中文版序

近年来，苏联文坛流行纪实文学热。在苏联当代文学中，纪实文学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内到国外，从战争年代到平时时期，从宇宙航行到恋爱、婚姻、家庭，几乎无所不包。苏联的纪实文学这个概念含义比较广泛，它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写“实”为主的纪实性作品，如近年引起轰动的谢尔巴克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另一种是与创作小说比较接近的纪实小说和特写。前一种类型的作品往往以其“实”来撩拨读者的好奇心和读书欲，产生较大的轰动效应，成为当今苏联纪实文学的“热点”。

《悲剧不应重演》就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

这部作品记述的是苏联30年代后期的“肃反运动”中的种种悲剧。20世纪30年代，是苏联革命史上极为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年代。1936年下半年，苏联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即所谓“肃反运动”。这场运动历时三年，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从苏联官方近年披露的数字看，当年冤死于“肃反运动”的人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在这场运动中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致使许多忠于马列主义的老干部、

老党员或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悲剧不应重演》所描述的，便是这场运动的缩影。此书着力揭露了“肃反运动”的决策人物贝利亚的阴险狡诈和残无人道。贝利亚是长期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阴谋家。他在上司面前奴性十足，阿谀奉承，是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得力干将，而在斯大林背后他却狐假虎威，干尽坏事，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贝利亚才受到应有的惩罚，1953年12月23日被处决。像贝利亚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阴谋家能够爬上高位，能够骗取人们的信任从而长期逍遥法外，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此书的作者苏伦·加扎良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曾亲身经历过骇人听闻的“肃反扩大化”。他在以大量的事实以及许多生动的故事揭露贝利亚之流的惨无人道罪行的同时，也叙述了自己受迫害的经历：由于揭发贝利亚的走狗克里米扬的罪行，他遭到克里米扬残酷的报复。他的母亲含泪离开了人世。他本人在狱中受尽折磨。作者以详细而锋利的笔触揭露了苏联“肃反运动”期间无辜的犯人在狱中的悲惨遭遇和非人生活。男看守监视女犯人脱衣、洗澡；一群刑事犯拿着理发工具闯入女澡堂，剃光赤身裸体的女犯人的头发；75岁高龄的职业革命家被判处25年徒刑，准备在狱中纪念百岁寿辰……作者在揭露贝利亚之流的罪行的同时，热情赞颂了遭受迫害的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赞颂了他们对马列主义、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一位受迫害者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祖国、阶级兄弟、领袖更神圣的了。”他们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必定战胜谬误，列

宁培育的党迟早要惩罚贝利亚及其同伙。在法西斯德国侵犯苏联时，他们一再向党中央提出申请，要求上前线，为保卫祖国流血牺牲。

苏联在30年代“肃反运动”中的教训是深刻的。作者在回顾了这段惨痛的历史经验之后，向党和人民发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悲剧不应重演。

郑海凌

1990年10月14日

出版者的话

1937年，当时身为格鲁吉亚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的苏伦·加扎良遭到非法逮捕。在长达十年的服刑期间，他经历了叶若夫—贝利亚式的残无人道的一场考验——审问、拷打以及对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和“间谍活动”的虚假控告。还有他那家庭的悲剧——一个“卖国贼”的家庭的悲剧……

1955年，苏伦·奥加涅索维奇·加扎良完全恢复名誉。

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着手写作，完成了一部记述他亲身经历的著作。可是，书刚刚完稿正准备出版时，国内局势发生了变化：谈论个人崇拜的话题再次被禁止。就这样，作者没有等到自己的书问世，就溘然长逝了。

下面我们援引的是《新世界》主编A. 特瓦尔多夫斯基写给C. 加扎良的一封信的全文。

最尊敬的苏伦·奥加涅索维奇：

我有幸拜读了您的纪实小说《悲剧不应重演》的手稿，它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应当说，我读过不少描述那个可怕年代（1937年）我国社会生活的作品，但我很难从我过去读过的回忆录中找出一部能与您的作品相提并论。对那些可怕的事实没有任何有意的夸大，极端审慎而真实，使读

者大吃一惊。(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似乎觉得，没有经受过这种考验的人不会产生足够深的印象，这是故意渲染。我应当再说一遍，您没有这种企图。)

看起来，您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人，精神异常坚定，能够经受住残酷的刑讯，然而并没有出卖灵魂，当时根本不是硬装英雄好汉，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求得缓刑。您以和读者完全一样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您也和常人一样有难过、惧怕和痛苦。就这一点来说，描述审判过程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的每章结尾部分的那些章节显得特别感人。因此，读者毫无保留地相信您所叙述的一切，而且作品对读者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就像他们同作者——作品的主人公一起亲身经历了他们不得不体验到的一切考验。

我想，我无需向您解释，现在为什么不能出版您的回忆录。可是我无时无刻不坚信，它们，还有相类似的其它一些作品，一定会问世并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也就是说，用人的价值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人。虽然这些回忆录的内容令人痛心，甚至有点恐怖可怕，但它们不会带来绝望，无出路。恰恰相反，它们将给人以精神力量和意志，使人们变得更高尚。

是的，这一切不能再重演，因为这些“方式”和“方法”，这些“手段”是地地道道地毁灭我们的目标和宗旨，使共产主义思想遭受打击，而且我们之中有谁“忘记”，有谁不希望“刺激伤痛”，那么，他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保存这些“方式”和“方法”。您的书完成了天职，建树了功勋和特殊的功劳。因为要完成它只有愿望是不够的，它需要非凡的才能和意志，需要有再次重现心灵中留下的那一些痛苦印

痕的意愿，最后，还需要付出巨大的精神上的和体力上的努力。

谢谢您付出了这一切，亲爱的苏伦·奥加涅索维奇。

我不能不指出，虽然我在读您的手稿时并未留意，更未赋予它特别重大的意义，这部手稿的文学价值也是很高的。它表现生活恰如其分，情节准确可信，语言生动朴实，提法明确而审慎。

祝您身体健康，心情舒畅，您建树了一桩光明伟大的事业。

您的A. 特瓦尔多夫斯基

1967'3.13

1 被 捕

1937年7月的第比利斯，天特别热。我刚刚休假回来。包扎着的脚隐隐作痛，静脉淤血尚未消失。

还是在基斯洛沃德斯克休息时，枪决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等人的消息使我们惘然若失。多么知名的人啊！

之后不久我在莫斯科得知，原格鲁吉亚内务人民委员季特·洛尔德基帕尼泽被捕。当时他在克里米亚供职。借口召他商讨工作把他逮捕。他的秘书盖克·阿加巴良请求返回克里米亚，但被告知说：“别忙，在莫斯科散散心吧。”三天之后秘书也被捕，和

洛尔德基帕尼泽一起被送往第比利斯。

为什么要逮捕这些人？

像往常一样，在莫斯科我在挚友苏伦·阿尔沙库尼家落脚。我们从1921年起就相识了，当时正值土耳其占领时期，我们一起在亚历山大从事地下工作。

阿尔沙库尼变得令人简直不敢认。从前他无忧无虑，朝气蓬勃，如今动不动就发怒，闷闷不乐。他是莫斯科测绘管理局的局长。

阿尔沙库尼说，莫斯科一片白色恐怖。每天都有党、苏维埃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和军队的指挥员被捕，他惶惶不安还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已经被捕，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小时后他自己会出什么事。

“可是你没有任何不安的理由！”我天真地说。

“是的，我没有任何担心的理由，我清楚我自己，可是，我又有足够的理由表示不安。你不知道，近一个月，特别是红军指挥员们被捕后，一切都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法律不复存在，没有检察机关，检察官们例行公事地批准不合法地逮捕领导干部，所有这一切都是借口要保卫苏维埃国家免受敌人危害，借口要同反革命作不调和的斗争。这种事不仅仅发生在莫斯科，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在埃里温（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逮捕了萨科捷尔、加里耶良、阿尔森、叶卡扬、德拉斯特马特捷尔、西蒙尼亚、涅尔西克、斯捷潘尼亚和其他许多同志，你了解这些同志不亚于了解我，……是谁发明了‘刽子手’这样的称呼？这些‘刽子手’毁灭国家，消灭诚实正直的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弄清楚？什么时候？”

听着这一切，我心情沉重，我难以理解这些话的正确含

义……

我该7月8日上班工作，可是在这前一天夜里就把我召去了。来得很突然。看起来，人民委员想同我谈什么“紧急任务”。

差不多休了两个月假期之后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切照旧，没有丝毫改变。我的表情严肃，这明显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影响所致。我不知道，第比利斯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到牢房去！

我的两个部下突然走进办公室，他们是处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和谢尔盖·达夫利亚尼泽。他们快步跑到我面前，抓住我的手使我不能把手伸进衣袋里去，并宣布说，根据委员的命令我被捕了。他们收缴了我随身携带的可放在口袋里的小手枪，命令我不许吱声，离开办公室，（是的，不要吵闹，仿佛我准备大喊大叫似的）同他们一起去警卫司令部。

在警卫司令部里，他们对我进行了仔细搜查，收走了党证、钱、手表，摘下了皮腰带。缠在伤脚上的绷带也拿走了，对我的抗议他们置之不理。

“只有监狱医生制作的腰带我们才允许带进牢房。”

包着铁皮的门开了。这扇门连接警卫司令部和牢房，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进了监狱。

昏暗的电灯照亮了狭窄的通道。押送我的看守长用大钥匙不停地敲打着腰带上的金属号牌，从而得到回答的信号。这些信号表明路是通的，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是一个斜坡，来到了地下室。

一盏小灯刚刚能照见不大的走廊。一名值班看守朝我们

走过来，把我收下，打开了一扇门，发出刺耳的轧轧声。我迈过门坎儿，门在我身后立即砰的一声关上了。

一开始，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是一间光线微弱的牢房，充满了人的汗气和浓重的烧草味。汗气和浓密的烟雾使牢房里显得更昏暗。

一群人头剃得光光的，赤身露体，只穿了一条裤衩的人们一下子把我团团困住。有几个人认出了我：

“苏伦，是你？”

“告诉我们，外边出了什么事？”

“还有谁被捕了？”

再没有别的问题比知道同巴斯克人的比赛结果更使足球迷关心了。西班牙足球队在莫斯科比赛，可足球迷们在比赛开始前夕被捕入狱，不知道比赛的结局……

我异常心平气和地承受了发生在我身边的一切，来到牢房以后我突然大打起哈欠来了，一个接一个。空气稀薄，我想睡觉。

“同志们，我想睡。”

有人把自己的位置腾给我，有人往我头下塞了个不知什么样子的枕头，我……时而熟睡，时而恍惚沉思。

一声大喝把我惊醒。

“起床，整理床铺！”

“什么，难道天亮了？”

是的，天已大亮。

从前，我对俗话所说“空气稠得连斧头也可以浮在空中”觉得不可思议，此时此刻全然明白了。

我朝四周望望，艰难地认出了熟人。这是米哈伊尔·拉

科巴。他高个子，宽肩膀，宽前额，又黑又密的双眉下面是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是阿布哈兹共和国民警局的局长，前阿布哈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涅斯托尔·拉科巴的弟弟。他的模样变得十分古怪，头好像大了许多：兴许是剃光了的缘故，也可能是肿了。

这位是第比利斯面粉厂的党委书记姆克尔季奇·哈恰图罗夫，小个子，身体虚弱，小写似的头，滴溜溜转的黑眼睛。他变化不大。

这是哈奇克·纳哈佩托夫。《狄纳摩》体育协会的副主席，他总是乐哈哈的，聪明而机智，俏皮话说不完，用不尽，应有尽有。哈奇克是位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喜爱的人。

这儿唯一一位衣着整齐又高又瘦的人走到我面前。

“您认不出我了吗？”他问。

我仔细打量他，可认不出他是谁。

“难道我变得面目全非了吗？”

他短短的头发，小胡子黑而亮，脸瘦小，尖鼻子，小嘴、薄嘴唇，什么也没对我说。可是眼睛黑黑的，像橄榄果一样的眼睛……我见过这双眼睛，我熟悉它们。

可是，年轻的天才的教授瓦达奇科里亚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变得这样厉害，以致于我会认不出来了。

“你，苏伦，我们1927年……”纳哈佩托夫说。

“那时，有一些共产党人坐在这间牢房里。”我困惑莫解地说。

“不，你太言过其词了，”纳哈佩托夫笑了笑，“我们之中有一个非党员，是的，唯一的一个。这就是他，我们的韦克斯勒，认出来了吗？”

有谁不知道韦克斯勒！在第比利斯他颇有名气，是豪华的“柳克斯”鞋店的经理。他在哪儿？看来，韦克斯勒正在忙碌：蹲在门后透过门缝在向走廊张望。

“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不这样干，”纳哈佩托夫解释说。

“索索·布阿奇泽被带走了，”韦克斯勒报告，“他不能走路，两个人在拖他。”

布阿奇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格鲁吉亚师的师长。

“沙姆舍·列札夫被带来了，他勉强能动。”

列札夫也是一位老党员。

“伦克维奇也在里边，他正被带到什么地方去。”韦克斯勒接着报告。

伦克维奇是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总顾问。然而，不仅仅是好奇心促使韦克斯勒总是隔着门缝瞭望，他患有气喘病，空气稀薄对他来说比其他人更难以忍受，透过门缝不管怎样总是可以呼吸到从长廊进来的点滴空气。

还有一件怪事。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的背部、双腿都布满红色条状伤痕，眼下发青并有淤血？这是为什么？拉科巴，纳哈佩托夫，恰恰图罗夫，还有韦克斯勒，一个个都遍体鳞伤，青一块紫一块的。一些人身上多些，一些人少些。一种意想不到的猜测油然而生，但我立即抛弃了这种猜测。不！这决不可能！

女护士走进牢房。她在巡视。

“有生病的吗？”

人们一个接一个朝她走去，一声不吭，让她看看紫色的伤痕。瓦达奇科脱去衣服，背上露出了红色的条状伤痕。

“梅拉莎，把擦伤涂上药，”护士吩咐。

梅拉莎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手提小桶和小刷子，像油漆匠一样在伤处涂上了碘酒。

“同志们，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擦伤’？”

“你要知道，这儿楼梯很陡，”纳哈佩托夫面带酸楚的微笑说，“因此，当我们被带去审问时，总是被绊着摔倒……于是就擦伤了。”

我为之可怕，浑身发抖……

“你瞧，你的同志们——肃反工作者们多么尽心尽力。”哈恰图罗夫说。

“我对您无话可说，我为他们感到羞愧。”

总之，1937年我在这间牢房里。不，不应当称它为牢房，这儿是地下室。监狱内部的洗衣房的附属房现在变成了牢房，恐怖分子们都监禁在这里。面朝人行道的小窗被厚厚的不透光的遮板挡得严严实实，大白天光线一缕也透不进来。不通电。打扫卫生时，我们尽可能在厕所多呆一会儿，以便能多呼吸点“空气”。

我们一共二十七个人，其中有二十六名党员，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都担负过重要的革命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被流放过，为创建和巩固苏维埃国家而英勇奋斗。

有一只罪恶深重的黑手把这些人从人世上一笔勾销，他们被控告犯有叛国罪。死亡在等待着他们。我说“有一只”是因为当时我们知之甚少，不能准确地判断形势。大家困惑莫解，千百次相互提出同一个问题：“出了什么事？这些人为什么应该死？”他们互相询问，都找不出答案。

然而，不管作出什么样的推测，结论只有一个：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骇人听闻的误会。我们应当永远是真正的布尔